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总主编：王巨才

延安影像主编：丁亚平



【第四十一册】

# 延安文艺档案·延安影像

## 延安电影家（一）

丁亚平 / 编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第四十一册】

总主编 王巨才

延安影像主编 丁亚平

## 延安文艺档案·延安影像

# 延安电影家（一）

丁亚平 / 编著



# 编撰说明

## BIANZHUANSHUOMING

1. 《延安影像》丛书的编写范围，以1935—1948年延安的电影家、摄影家及其创作活动为中心，兼顾其他地区，如冀察晋“边区”及东北等“解放区”的相关人物及活动。

2. 《延安影像》丛书着意呈现文献史料的特色，其编写与选辑原则，立足于史实及史料，坚持谨严、全面的原则，竭尽全力搜集资料，努力实现学术文献性与电影、摄影艺术和历史视角的统一。

3. 《延安影像》丛书，分为《延安电影家》《延安摄影家》及《延安影像作品》三大部分。其中，《延安电影家》《延安摄影家》分为传略、相关典章、忆述评论、创作及活动年表以及主要研究论著索引五个板块；《延安影像作品》分为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正文部分选编延安时期电影剧照近两百张、摄影照片四百多张，附录则为延安影像大事记。

4. 所撰电影家、摄影家的传略，包括该艺术家生卒年月、个人生平经历等内容，突出其在延安时期的影像创作及相关实践活动，兼顾1948年以后的影像创作或社会活动等经历。对部分电影家、摄影家不同阶段的影像创作与理论、评论工作及其主要贡献、重要影响等，也做了概述。

5. 相关典章部分包括电影家、摄影家的个人自述及其对相关作品的评论等内容。忆述评论部分收入时人或后人对特定人

物及作品进行述评的相关资料。此二板块内容相互印证，使延安电影家与摄影家的面貌及其研究情况，能够立体地呈现出来。

6. 创作及活动年表以时间为序，以条目形式简明交代所收入电影家、摄影家的相关实践活动。主要研究论著索引分为专著和文章两部分，各部分以时间为序，尽量全面地收入对其人其作研究的成果，以方便读者查阅。

7. 影像作品选辑延安时期影像类创作的代表作。在每部电影的剧照之前，撰写了导论性的前言，以期与文献及图片互证，供读者参考。摄影作品以年份为编排顺序，同一作者或创作团体的作品集中呈现，并辅以文字说明。延安影像大事记则全面再现延安影像历史上的大事。

8. 本丛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许多单位和个人的热情支持与帮助，谨表谢忱。

电影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艺术,也是能以巨大的魅力作用于精神的艺术。为了掌握这个文化新形式,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处于政治斗争风口浪尖的中国共产党,就对电影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sup>①</sup> 党的关注与介入给当时的电影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现了中国电影文化迅速发展转型的趋向,中国电影史上的左翼电影横空出世,一批革命电影的中坚人才得到培养,为以后党的电影事业的发展积蓄了力量。1938年夏,延安电影团成立,党才真正开始直接掌握电影这个文化武器,这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从此以后,中国电影人在延安这片土地上迈上新的征程,为具有“延安电影风格”的中国电影特别是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奠定了坚

<sup>①</sup>刘建勋:《延安文艺史论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

实的基础。延安电影团的成员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以饱满昂扬的创造热情迈出了人民电影事业的第一步,从此揭开了中国电影史上崭新的篇章。

## 一、延安电影的兴起

### 1. 延安抗敌电影与文艺阵地建立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炮火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并掀起了抗战怒潮。广大民众对当时电影界拍摄的脱离社会现实的神怪武侠片表示不满,提出“猛醒救国”,要求各大电影公司拍摄抗日电影,鼓励抗战。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电影运动配合了民众的抗日运动,促使饱尝日本等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左翼电影在群众中显示出较大的政治号召力,但在商业逻辑和特定社会环境中有其迂回曲折隐蔽的特性。要继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中国的文化阵地就不得不从上海转移。然而重庆已被国民党占领,在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建立自己的文化中心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sup>①</sup>

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一支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入驻并扎根延安,开始投入抗敌战斗的文艺活动之中。这支文艺部队是由三个方面组合而成的:一方面是原来陕北苏区的文艺队伍。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这里就活跃着一支文艺队伍,尽管规模不大,却有不小的影响,其中以杨醉乡领导的列宁剧团最为著名。这是延安抗战文艺的根基。第二方面是来自中央苏区的文艺队伍。在江西时,中共就很重视文艺工作,乡村剧团十分活跃。后来,大部分文艺干部长

---

<sup>①</sup>吴筑清、张岱:《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征到达陕北,如创造社的成仿吾、代表党与鲁迅交往且友谊颇深的冯雪峰、戏剧家李伯钊,以及危拱之、王亦民等。他们不仅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文艺节目,还带来了宝贵的文艺工作经验,这成为后来贯彻执行延安抗战文艺方针的中坚力量。第三方面是从国统区来延安的大批文艺家。他们为了追求进步,同时也为了抗日救国,通过各种途径奔向了延安。<sup>①</sup>延安电影团的创作者和大批延安文艺工作者从四面八方会集到延安,在全新的环境与条件下,开始身体力行中国文艺事业的新章程,并开出了新异而璀璨的花朵。

## 2. 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与延安电影创作力量的形成

左翼电影运动一度主导了整个上海电影界,它是在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指导下进行的。1931年9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发表《最近行动纲领》,明确提出左翼电影的行动方针、任务和策略等。尽管其内容有偏“左”的痕迹与嫌疑,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具有明显的进步倾向,这是不容置疑的。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下,要拍出进步电影,谈何容易。尽管如此,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工作者还是克服重重困难,与市场当局争取电影阵地:一方面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领导和开展左翼电影运动;一方面团结争取更多的电影工作者、文化人士和电影公司的老板,如夏衍、田汉和阳翰笙等积极打入明星、联华、艺华和新华等电影企业中去,动手创作电影剧本,并且和蔡楚生、史东山、孙瑜、吴永刚等导演亲密合作。他们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工作,通过谨慎模仿和努力适应,尽可能地在影片中贯彻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体现党的政治立场,反映时代潮流,呼应人民的诉求,进行政治化的积极探索和大胆尝试。

---

<sup>①</sup>孙国林:《抗日战争中的延安文艺》,《文史精华》,2005年第12期。

1933年3月,经时任中共上海地区领导人的瞿秋白同意,中共决定组成电影小组,这是党内专门负责左翼电影运动的组织。小组由夏衍、钱杏邨、司徒慧敏、王尘无和凌鹤五人组成。“小组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电影剧本创作力量、电影评论、人才输送,以及开展有关中国电影文化运动的讨论等工作。”<sup>①</sup>1934年春,电通电影制片公司成立。<sup>②</sup>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电影公司。电通公司的袁牧之和吴印咸等人通过影片创作表达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这与人民群众救亡图存的强烈心声遥相呼应,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在影片《桃李劫》中,袁牧之任编剧;在影片《风云儿女》中,袁牧之任导演并参与主演,吴印咸摄影;在影片《都市风光》中,袁牧之任编导,吴印咸摄影。这两位后来延安电影团的骨干,作为电通公司影片的主要创作人员,从那时开始他们便进行技术上的合作,并并肩战斗,一起为共同的目标——他们热爱并愿意为之献身的电影事业而奋斗。后来,在电通筹备拍摄新作《街头巷尾》时,田汉、阳翰笙等电影人士遭遇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导致电通关闭,新的左翼电影计划宣告破产。在这条最直接的战线上,延安电影团的两位骨干在创作过程中,培养了深厚的感情和现实主义的艺术自觉意识,这为日后他们同赴延安及其在延安电影团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国难当头,强烈地震撼着包括袁牧之和吴印咸在内的所有的电影人。紧张的战事使得上海时势剧变,已不再适合进行电影的拍摄活动。心灵的自由是自己给的。不久之后,袁牧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到延安去!到华北敌后根据地去!在袁牧之从

<sup>①</sup>吴筑清、张岱:《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sup>②</sup>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378页。



上海撤退到武汉时,阳翰笙代表党非常严肃地告诉他:中国共产党要在延安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自己的电影机构,而不是仅仅去延安拍摄一部电影那样简单。袁牧之这才意识到责任的重大,去延安是从革命长远的需要考虑,意味着要从此着手建立党直接领导的电影事业。<sup>①</sup>袁牧之提高认识,转变思想,根据党的指示,在完成了技术上必要的准备之后,带着一批简陋的设备,和好友吴印咸从汉口奔赴延安——陕甘宁边区的大本营,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电影事业的起点。

在延安电影团成立之前,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曾于1938年4月1日在延安成立。电影社成立后,即发表启事,公告各界,宣布该社的任务是:(一)用抗战血的代价来教育全国人民更坚决地抗战;(二)告诉全世界人民,中华民族在为正义而战,以博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它除拟拍摄抗战影片外,还将摄制前方抗战和边区生活的新闻照片。<sup>②</sup>由于器材短缺和战事紧迫,抗敌电影社未能顺利开展工作。虽然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未开展多少电影工作,但是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开拓新的电影表现领域所进行的最初尝试,可以代表抗战电影的新风气,也是延安电影团的雏形,为日后延安电影团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 3. 艰苦的创作环境与昂扬的创作热情

延安,原名肤施,坐落在陕北黄土高原中部,是一座依山傍水、群峰拱卫的山城。由砂岩和黄土夯筑的城垣,从延河岸边蜿蜒到凤凰山巅,形成“山抱延城城依山,城边延水逐山弯”的雄伟景象。<sup>③</sup>1938年金秋时节,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

---

①吴筑清、张岱:《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第37页。

②钟敬之、金紫光:《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第16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17—618页。

③吴筑清、张岱:《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团(延安电影团)正式成立。袁牧之和吴印咸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着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这样的场面,不让影像工作者起心动念是不可能的。这种场面被袁牧之和吴印咸深深地捕捉到,并成为以后延安新闻纪录电影的宝贵资料。

但是,艰苦的创作条件几乎堵死了一切创作通道。首先,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没有电,拍电影而没有电,拍照片而大礼堂里没有照明灯;其次,胶片很少,即便有基本上也都是过期的;其三,延河的水是黄土高原上河流中的水,不是适合用作洗印底、正片的正常水。<sup>①</sup> 这些问题给当时的电影创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虽然大家尽可能努力创造条件,但没有充足的制片设备,没有胶片,没有洗印胶片的条件,还是无法开展正常的创作工作。当时电影团没有电影工作可做,于是开始裁减人员或者合并部门,但党和组织高度重视人民电影事业的发展,不愿失去这块文艺阵地,故将其保留下来。主持电影团日常工作的吴印咸为了减轻党的负担,克服困难,带领电影团的工作人员开荒种地,自给自足,开办起了照相馆。据吴印咸回忆:当胶片来源愈来愈少时就实行生产自给,利用废胶片制作证章,搞照相馆,办摄影展览会等,像个小工厂似的,不仅没要公家的钱,还盖了六间新屋。同时也进行开荒生产,还上缴了粮食。此外还参加打柴、修飞机场、帮助老百姓锄草等劳动。<sup>②</sup> 大家在工作之余尽量利用现有条件进行文化宣传工作,巡回放映电影,举办摄影展览。除了创作条件的艰苦外,电影团成立之初只有六人:袁牧之、徐肖冰、吴印咸,还有三位做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的人员。当时,拍摄影片的设备只有两台,一台是伊文思送的35毫米的独眼

<sup>①</sup>倪震:《中国摄影艺术的世纪同龄人——纪念吴印咸100周年诞辰》,《当代电影》,2011年第2期。

<sup>②</sup>袁牧之等:《解放区的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埃姆”摄影机,另一台是袁牧之在香港买的 16 毫米的“飞力姆”摄影机。

艰苦的创作条件绝对不会影响电影团工作者的创作热情,袁牧之他们为制作影片紧张地做着准备工作。他们积极地投入朝气蓬勃的革命生活中去,参加延安的各种集会、演讲会、座谈会和演出,聆听领袖们的讲话,参与各种活动。<sup>①</sup>原本准备拍完一部影片就回武汉的吴印咸,受到党的教育和创作气氛的浸染、熏陶,选择留在延安这片战斗的土地上,在战斗的最前线,和他的好友、工作上的伙伴袁牧之一起为人民电影事业而奋斗。

## 二、延安电影团的电影活动

### 1. 延安新闻纪录电影创作

延安时期的电影创作实际是对延安军民的真实生活的电影化记录。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给中国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带来了新的思想感情和美学元素。这些作品保持着历史原型和记录美学风格,是我国早期电影纪录片的雏形,而独具一格的延安电影风格为之后中国的纪录片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延安的新闻纪录片创作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短小精巧的新闻素材拍摄。这些新闻短片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较为复杂立体的人物形象,只是截取生活、生产和战斗的某个片段、某个场景,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形式直接,传播范围广泛。第二,重要中央会议的拍摄,如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内容上,作品以较长的篇幅,记录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的报告与发言。对其他许多代表发

---

<sup>①</sup>吴筑清、张岱:《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的故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61 页。

言的情况和参加大会的情况也都会做多视角的生动的记录。<sup>①</sup>在拍摄手法上,反复渲染,追求丰富的内涵表达,创作态度极其严谨。从题材内容的选择到拍摄技术的讲究,再到艺术表现手段的发挥,电影团的创作人员都做了积极的努力。第三,纪录电影的创作,如《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南泥湾》)。影片虽不反映非常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人物激烈变化的思想,但进退盈缩,与时变化,笼罩在时代生活中。纪录电影注重对时事的宣传,深入战斗生活,深入群众,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服务,同人民群众和革命斗争紧密结合,传达了浓郁的时代气息,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作为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创作方法,延安新闻纪录电影凭借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战事宣传的指向性,同样富有战斗力,深深鼓舞着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与此同时,国外友人也在积极参与延安新闻纪录片的拍摄,用电影和照片记录抗日军民的革命历史,成为记录中国人民顽强抗战和英勇拼搏的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1939年5月,苏联纪录片导演罗曼·卡尔曼来到了延安,他先后拍摄了延安工人学校的开学典礼,鲁迅艺术学院学生的开荒、生产、上课和展览会,八路军的军医院,印度援华医疗队,安塞托儿所的儿童,等等;也拍摄了毛泽东等领导人工作和活动的镜头包括在窑洞里办公的画面等。卡尔曼还拍摄了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大学上课和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校阅队伍的实况。<sup>②</sup>国外友人重在呈现解放区军民崭新的生活与富于诗意的现实情境,包括领导人的生活与工作等,可谓事无巨细。

延安电影团的参与者们来到延安,不再是单纯的电影创作者,也是斗志昂扬的战士,他们以直接的电影化的表达方

<sup>①</sup>刘建勋:《延安文艺史论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

<sup>②</sup>黄琳、张珂:《国际友人与陕北革命根据地新闻纪录片》,《电影评介》,2006年第21期。

式创作电影,摒弃了诗意的、抒发个人情感的创作方式,手持摄像机直面战斗历程和革命生活,开创了现实主义的戏路与风格。

## 2. 延安放映队

延安电影团的成长与其放映活动的开展,具有直接的联系。电影做政治宣传,也只有通过放映与观众见面,才能起到宣传革命与现实教育的作用。放映队人员为了使仅有的影片赢得更多观众,充分发挥影片对边区人民的宣传、鼓舞作用,需要克服重重困难,精准地掌握放映技术。放映队按照领导的指示,不是单纯地放映电影或简单地讲解影片内容及其教育意义,而是“随时结合形势及当时的情况,进行现实教育,把放映电影当作一种政治工作来完成”<sup>①</sup>。因此,放映队快乐、积极地工作,对当时宣传抗战、传播革命思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8年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稼祥从苏联回到延安,随身带回一套苏联制造的K101型35毫米皮包电影放映机(移动放映机),同时带回来的还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我们来自喀琅斯达得》《夏伯阳》《十三勇士》《祖国儿女》等一批苏联原文版影片。<sup>②</sup>此时延安电影团还未正式成立,没有专业放映员放映这些影片并保管这些器材,常有火灾事故发生。八路军总政治部为了对延安的军民进行广泛抗日宣传、政治教育和丰富其文化生活,也为了避免事故再次发生,继1938年9月延安电影团成立之后,又于1939年9月正式成立延安电影放映队。当时延安并没有人会放映电影,于是根据革命宣传工作的需要,从抗大等单位调来一些人,专门学习电工机械和电影原理;具有电影放

---

<sup>①</sup>袁牧之等:《解放区的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版,第21页。

<sup>②</sup>吴筑清、张岱:《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映经验的余丰任队长,给放映队培训时教放映机和发电机的操作方法;电影团的吴印咸从前线回来后给放映队讲电影原理与摄影技术。放映队将放映技术的学习当作前期的主要任务,1942年他们开始了正式的巡回放映。

作为陕甘宁边区的唯一一支放映队,延安放映队承担着为部队、机关、学校以及边区一百五十多万群众放映电影的任务。而当时的条件是十分艰苦的,没有室内影院,只能露天放映;放映队的工作又是流动的,主要依靠马匹来完成运输。只要有任务,不管是数九寒天还是炎夏酷暑,队员们将放映机、马达和拷贝往马背上一放,赶着牲口就走。他们的足迹踏遍了边区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远渡黄河抵达晋西北的抗日前线。尽管放映一场电影要中途停机换片,有时要修三四回常年磨损、缺少维修的设备,尽管使用边区土法炼制燃料的发电机常出现故障,<sup>①</sup>但放映队的电影放映仍是边区最受欢迎的宣传形式之一。

1940年2月,周恩来从苏联莫斯科治疗摔伤的右臂回国时,把共产国际赠送的一部16毫米放映机,一些苏联新闻片和故事片以及电台器材等一起带回延安。回国后不久,周恩来就亲自用16毫米手摇放映机,给大家示范放映从苏联带回来的新拍影片《大战张鼓峰》直至深夜。后来,周恩来把这架小放映机以及影片等器材一并交给了延安放映队。1942年,周恩来自重庆又带回一台16毫米放映机,并“通过关系引进了一批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影片《保卫斯大林格勒》《虹》和《女战士》等”<sup>②</sup>。这些器材和设备的引进,犹如雪中送炭一般,给放映队带来了战斗的“钢枪”和动力,他们对放映技术和所放映电影的内容也越来越熟悉,放映工作逐步步入正轨,其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大。

<sup>①②</sup>刘守华:《战火烽烟中的延安电影业》,《百年潮》,2006年第1期。

放映队的工作人员还克服了苏联影片俄语翻译的困难。因外语能力与文化水平所限,边区观众无法欣赏俄语原版片,放映队就进行同期口译。口译要做到让妇孺都能听明白。放映队还在放映前夕或间歇,对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人物关系做一些简要的补充。在手摇发电机特有的机械伴奏声中,手持话筒的工作人员用带着乡音的解说,促使观众加深对影片内容的理解,因此大受欢迎。苏联影片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激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对当时正处在革命斗争时期的边区军民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在艰苦的历史条件下,延安放映活动及其所特有的亲切感、意义价值,让抗战军民在电影的世界流连,这不能不视为一种艺术上的胜利。

### 三、延安电影团创作成果

#### 1.《延安与八路军》:开团之作

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在陕西中部黄帝陵开拍了长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第一个镜头,这是延安的电影事业中第一个有意义的精神原点。桥山是中华民族祖先——黄帝的陵墓所在地,袁牧之的艺术构思可谓匠心独运。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延安与八路军》这部电影从这里开始。“镜头慢慢摇过,它将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誓死抗日救亡之先驱’的决心传达给全天下,将再次通过黄帝的史迹,唤起炎黄子孙炽烈的爱国热情,动员他们在日寇猖狂侵略之际,奋起抗战,誓死保卫祖国,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政治与艺术的结合,表达着共同的心愿、共同的呼唤,其意义可谓极其深远。”<sup>①</sup>

---

<sup>①</sup>吴筑清、张岱:《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延安与八路军》由袁牧之编导,吴印咸、徐肖冰摄影。影片展示了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民主生活和战斗风貌,表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投奔革命,献身理想以及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的动人场面。全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追求进步的青年冲破艰难险阻奔向延安;第二部分,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第三部分,八路军的战斗生活;第四部分,抵延青年的学习及开赴各地工作的情景。为了使这部影片的内容更加丰富,在延安的部分拍摄完之后,1939年1月,电影团摄影队分两路到敌后拍摄:吴印咸去晋西北及平西(北京以西)妙峰山一带;袁牧之、徐肖冰去晋东南及晋察冀一带。在他们动身的前一天,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接见了袁牧之、吴印咸和徐肖冰,鼓励他们说: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发挥你们的能力,但将来的工作是很多的。又说:现在拍长征就不可能,过几年你们就能拍了。<sup>①</sup>这番话,充满对未来的追求和憧憬,给了他们鼓舞和激励。

1939年年初,《延安与八路军》摄制组带着党和毛主席的嘱托和期望,离开延安,渡过惊涛骇浪的天险黄河,到达华北敌人后方,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的前方部分。他们首先到达晋西北地区,拍摄了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等将领在前方的活动,拍摄了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的部队生活及民兵的操练活动等。随后,他们越过雁北的崇山峻岭,冒着极大的危险,穿过敌人严密的封锁线,进入晋察冀边区,拍摄了聂荣臻司令员在前方的活动。伟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前线救死扶伤的光辉事迹,边区群众的民主政治生活、敌人的残暴罪行等也一一得到聚焦记录。摄制组经过商议,决定由袁牧之带着这批已拍好的底片先回延安,以便争取时间创造条件,尽

<sup>①</sup>钟敬之、金紫光:《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第16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20页。



快进行电影的后期制作。按拍摄提纲要求尚未拍摄的部分,由吴印咸和徐肖冰兵分两路到平西和晋东南去拍摄。在此之前,徐肖冰一直担任吴印咸的摄影助理。为争取时间,分头行动后,徐肖冰开始独立拍片,吴本立担任了他的助手,马似友担任了吴印咸的助手。分手前,袁牧之千叮咛万嘱咐,要大家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摄影机和胶片。因为胶片的得失关系到正在制作的影片的存亡,而来之不易的两台摄影机,更像战士手中的枪一样,是开展电影工作进行战斗的重要武器。<sup>①</sup>

回到延安的袁牧之开始积极准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工作。但是摆在袁牧之眼前的是比拍摄还要巨大的困难,延安缺乏最起码的技术条件,无法进行后期工作。国内局势紧张,党中央只能派遣袁牧之带着已经拍摄好的胶片到苏联去完成后期制作。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苏德战争爆发,袁牧之从延安所带的《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全部遗失。

《延安与八路军》是延安电影团摄制的首部电影,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首部电影。其内容不仅是我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的文献史料。这部未能最终完成的长纪录片,倾注了延安电影团所有成员的无限真情和巨大心血,也寄寓了党对电影事业的殷切期望。它的意外丢失是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 2.《南泥湾》:艰辛之作

1943年2月4日,长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作为延安拍摄制作完成的第一部完整的、凝聚着电影团辛勤劳动与智慧的影片,在延安直政大礼堂举行了首映式。这部影片真实而全面地记录了人民军队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

---

<sup>①</sup>程季华:《袁牧之与新闻纪录电影》,《电影艺术》,2002年第5期。